责编：泰阳　E-mail:ccps6235@126.com　Tel:010—62806235　　2014年9月22日

国防视点

中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刘庭华

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首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德、意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东、西方分别酝酿，通过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而逐步演变成为全面战争的。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法西斯侵略战争策源地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时，即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发动以争夺中国东北为目标的日俄战争，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等地，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增强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列强中新崛起的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1927年7月，日本政府提出所谓解决“满蒙政策”的“田中奏折”，宣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露骨地表明了日本侵占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

世界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把战火是由日本点燃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打响了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枪，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完全按照“田中奏折”所确定的侵略计划实施，它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因此，九一八事变不是中日两国之间局部性、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而是日本企图实现其独占中国，建立大东亚帝国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两年多后，德、意两国在西方形成战争策源地。德、日、意法西斯结为反动同盟，成为国际上最邪恶、最凶残、最反动的势力，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九一八的炮声向世界宣告，日本点燃了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马占山率部领导的江桥抗战、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和广大东北义勇军的对日斗争，给日本法西斯严重打击。总之，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争战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了以灭亡全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它对世界产生了牵动全局乃至改变格局的影响。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法西斯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升级，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以说，七七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点，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七七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日战争，在世界东方首先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双方先后投入的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市，战区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直接和间接卷入的人口达4亿多人，中日战争成为世界基本矛盾的最高表现形态。

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制约日本“北进”和“南进”，保障了同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实施。“北进”和“南进”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企图不仅是要灭亡中国，而且要以整个中国大陆为后方基地，北攻苏联远东地区，南攻西南太平洋地区，进而与德意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这就是说，占领中国是日本实施世界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战场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始终要受到中国战场的制约和牵制。

中国始终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民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力量。特别是把日本陆军主力死死地牵制在中国战场上，牢牢地捆住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它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仍有百余万日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长期而大量地牵制、消耗和歼灭日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日本全面侵华后，德、日、意三个轴心国进一步勾结，急切谋求战略上的协同配合，加紧筹建军事同盟，先后于1940年9月、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签订了“同盟条约”“联合作战协定”和在全球划分作战范围与任务的“军事协定”。据此，德、意与日本彼此承认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并保证“互相援助和合作”。而在一方受到他国攻击时，“三国保证以政治、经济和军事之一切手段互相支援”。中国的持久抗战，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致使日军被迫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南进；并且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会师中东和西伯利亚、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和后方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席卷了菲律宾、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由于盟军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丧失了太平洋沿岸一系列战略要点，从而使缅甸成为盟军与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日军若是占领缅甸，便可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并可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上的海战及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1942年1月21日，丘吉尔在致伊斯梅尔的电报中指出：“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罗斯福在2月23日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的电报中也指出：“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的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由于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丘吉尔、罗斯福都亲自出马吁请澳大利亚将正从中东调回澳大利亚本土的澳军2个师改调增援仰光，支援缅甸防御作战，但均遭拒绝。

在此情况下，英国急切请求中国派兵支援。中国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的战略需求，中国抗战尽管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还是毅然派出远征军，紧急开赴缅甸，直接支援盟军作战。在担负曼德勒正面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先后取得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东枝收复战等重大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而英军担负的缅甸西部防御却被日军迅速突破，英军主力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紧急求救，经中国远征军驰援解围，才使其7000余官兵得以安全撤往印度，构筑新的防线，保卫了印度的安全。此后，在反攻缅甸作战中，由于英国一直持消极态度，中国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利益和实施盟国的战略计划，毅然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一部的配合下，率先发起缅北、滇西反攻，胜利地打通了中印公路，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并为盟军最后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在援缅作战中，先后投入30余万兵力，历时3年多，共歼日军6万余人，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当局的战略设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中国的持久抗战是美英盟国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先决条件之一，而且中国战场也是盟军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攻及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内的中国空军机场降落，并转至云南昆明空军基地休整。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的轰炸，朝野震惊。7月4日，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3年3月10日又奉命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继续利用中国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中国为美国提供了所需空军基地、第一线野战机场及地勤人员，其空军基地主要有成都、昆明、柳州、桂林、衡阳、宝庆（邵阳）、芷江、老河口等，第一线野战机场更多。为此，中国方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军民还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至1945年春，先后被中国军民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即达70余名，其中包括后来曾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等。

中国战场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军事情报。抗战期间，苏联一直派军事情报组驻延安，中国共产党方面将搜集到的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材料，提供给苏方。当中共中央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1941年6月21日进攻苏联时，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转告苏方。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方曾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中共中央允许美军在晋绥、太行等地和在华中新四军第5师区域内设立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在华南，美国第14航空队也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联系。

1941年下半年，中国有关部门从日军航空兵的调动和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日军有在太平洋采取行动的企图。中方立即将这一战略情报通知了美国国防部。但未能引起美方的重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方开始重视中方的情报系统，遂在国统区普遍设立无线电通讯网、气象站等。

中国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苏、美等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以帮助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但这些贷款大部分规定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予以偿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价值4.5亿美元的矿、农牧产品，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军事战略

甲午清军的失败不在军力而在军制

□余和平　迟延年

结构决定功能，1＋1可能大于2，也可能小于1。金刚石和石墨的基本元素都是碳，但表现出来的性能和价值却有天壤之别。甲午战争前，从武器装备的角度看，中日军队实力对比不相上下；但从军事体制改革的角度看，中国却远远落后于日本。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和制度却留下了。”

晚清政府从1862年开始实施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打造“利炮坚船”和“利器精兵”，实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目的。通过洋务运动，将近代西方枪炮和舰船技术引进中国，购买和制造近代武器装备，使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同时，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兵工厂，并开办近代军事教育、外派军事留学生，培养海军军官。

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改革带有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仅止于购买西式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器物”层面，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深层次改革没有明确的认识和具体措施。“只变事不变法”，许多区域性改革最终陷入因人而兴、人去则废的境地。特别是，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收效甚微，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装备新式枪、炮、舰的军队仍旧保持着过时的“勇”“营”编制，旧规与新章互相干扰。虽然晚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但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各自为政，并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和协同行动。学校教学、训练内容、训练指导、训练法规都没有统一标准。用陈旧的思维方式和体制机制指挥管理新式海军，导致花费巨资建设的军事力量形同散沙，不能形成有效的整体战斗力。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既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作为战争实际指挥者的李鸿章，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仅限于他所节制的淮军和北洋海军，福建海军和南洋海军完全置身事外，充当“旁观者”的角色，甚至为李鸿章的北洋海军被削弱、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而“窃喜”。一盘散沙式的中国军队，最终难逃被各个击破的命运。

而日本，虽然军事改革略晚于清朝，但改革目标明确，总体筹划得当，改革措施有力，改革的速度和力度远胜于清朝。在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军事教育的同时，日本强调在制度机制上学习西方，陆军从编制到战术都模仿德国陆军，海军则师从英军。日本陆海军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吸取了西方进攻性、掠夺性、殖民性的军事理论精髓。

日本还大力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近代军事指挥体制。1872年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1878年成立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组成的中央军事机构，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分立。1883年把军队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建立近代化军队组织体制，实现了中央对军权的统一。1893年5月，日军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确立举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战时最高司令部体制。经过20多年的准备，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不仅在兵力上具备了海陆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而且其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也为海陆协同作战提供了组织保障。1894年6月5日，日本又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以确保在其即将挑起的侵华战争中对海陆联合作战的统一指挥。战争爆发后，日军作战目标明确，指挥协同顺畅，巧妙利用中国军队各自为战的弱点，各个击破，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巨大的军事胜利。

军事变革

由战争倒逼的美陆军战斗力建设

□刘鹏　赵戈

近期，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伊拉克安全局势，美军高层提出了军事介入的多种方案，但同时明确表示不会派遣地面部队。陆军是执行反叛乱任务的决定性力量，美军高层却将其排除在外，这不禁令人对美陆军战斗力建设的现状产生疑惑。

过去13年间，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持久的非正规战让美陆军陷入越战式泥潭。然而，巨大伤亡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和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严酷的战争现实倒逼美陆军反思战斗力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偏差，通过持续改革推动战斗力建设重回正轨。

编制结构向“精干、高效、多能”方向发展

结构决定功能，编制结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强弱。迫于前线兵力紧张的压力，美陆军现役部队总员额从2001年48.2万增至2010年57万。然而，实践证明扩大规模和增加员额并不能确保战争胜利，臃肿庞大的“大陆军”不能适应城市巷战、反叛乱和稳定行动需要，不符合“第四代战争”的特点和要求。具有这种战争典型特征的阿、伊战场各种威胁混合交织、形势瞬息万变，只有“精干、高效、多能”的新型陆军才能适应多变的战场环境。残酷的战争现实迫使陆军高层下决心给部队消肿，提出“纵深、多能，适应、创新，灵活、敏捷，联合、同步，致命、区分”的战斗力建设目标。为实现该目标，美陆军现役部队将从战时的57万减至44万，现役旅将由38个减至32个，重点削减各级领导机关和指挥机构，同时力求减少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影响。此轮“瘦身”并非单纯减少机构和人员数量，而是重在优化重组，通过优化结构提升部队战斗力。

编制结构调整还体现在模块旅的重新设计上。为增强火力、机动和防护力，美陆军的每个旅将新增一个战斗机动营，各旅编制员额增加约700人。新增战斗机动营的兵力主要从现有旅战斗队中抽调，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旅被裁撤。根据2003年以前的设计和构想，陆军所有战斗旅都拥有三个机动营。然而，美陆军在模块化建设过程中一度认为，各旅新增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力量可取替第三机动营，因此步兵旅和装甲旅只保留两个机动营，只有“斯特赖克”旅保留了三个机动营。但是，在多年战争中，从战场回来的各级指挥官强烈要求恢复步兵旅和装甲旅第三机动营编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战斗、巡逻和安全警戒任务的完成。陆军高层在慎重考虑各方意见基础上批准了这一建议。从目前看，陆军将有47个旅增加第三机动营编制，而且所有现役旅都将获得更多的工兵力量和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原来的战场监视旅改为监视与侦察旅。新的监视与侦察旅不仅员额增加，侦察力量和手段加强，还新增了炮兵等火力打击要素，从而在发现目标的同时能够及时对目标实施打击。

组训方式注重以指挥官为核心

军事训练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美军曾明确规定，指挥官是训练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只有指挥官有权力和责任训练所属部队达到高标准战备状态。然而，在多年战争中军事训练却逐渐被微观管理和精细控制所取代，指挥官在计划、组织、实施和评估训练中的地位作用不断下降。战场和训练场上成百上千页的作战文书和技战术流程详细规定了作战和训练的各种细节，扼杀了各级指挥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针对这一现状并着眼实战需求，美陆军积极推动以指挥官为核心的军事训练改革，建立新的训练管理流程，推行基于任务式指挥的训练转型，要求各级指挥官切实担负起训练部队并达到标准的责任。以指挥官为核心的组训方式提倡各级指挥官充分发挥主动性，大胆决策并勇于承担风险，而不只是盲目服从上级命令。为激发各级指挥官主动性和创造性，美陆军在训练中不断给指挥官出难题，有些训练甚至逼迫指挥官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违反规定甚至违抗命令才能实现上级意图并达成作战目的，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指挥官在战场上突破条条框框束缚，灵活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以指挥官为核心的组训理念也体现在训练环境建设中。美陆军的“一体化训练环境”将指挥控制系统与模拟训练系统综合集成，组成联合模拟训练系统，使指挥官难以分辨实兵、虚拟和模拟训练模式之间的区别，获得靠前指挥的切身体验。此外，“虚拟沉浸式训练环境”设计出纷繁复杂的各种战场环境，逼迫指挥官在各种急难险境中临机决断，凭经验和直觉大胆决策并敢于承担风险，深刻体会“训练场就是战场”“训练就是打仗”的内涵。指挥官在组训中的表现会被记录下来作为事后评估的重要内容，帮助其分析利弊得失、查找问题不足。

武器装备研发向实战聚焦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建设的物质基础。多年战争留给陆军深刻教训：高技术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未必好用，只有那些适应战场环境、满足实战需求的武器装备才为前线官兵所接受。据统计，在伊、阿战场阵亡的官兵半数以上丧命于简易爆炸装置，这一严峻现实迫使陆军放弃高科技的未来战斗系统，转而研发能够有效应对游击战、路边炸弹、狙击手的实用装备。此外，美陆军每年举行武器装备创新评比，请前线基层官兵作评委，不以科技含量为标准，而是紧贴实战需求、向任务和实用聚焦，评优的武器装备必须经过实战环境考验并以此作为未来武器装备研发风向标。

从实战需求出发，美陆军武器装备研发聚焦提高单兵和班的战斗力，注重提高单兵和班的杀伤力、机动力、防护力和态势感知能力。为增强战场态势感知，美陆军把构建并完善陆战网置于首位，构建由战术信息网、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联合战斗指挥平台和网络勇士等五个项目共同支撑的“单一、安全、标准化的网络环境”。除陆战网外，从实战出发的美陆军还把新型陆战车和联合轻型战术车作为武器装备更新的关键项目。新型陆战车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实战需求，可搭载九人步兵班，生存和防护能力、机动能力以及作战网络综合集成，能够在复杂地形条件和近距离作战中有效实施火力打击和机动应战。具备防地雷反伏击性能的联合轻型战术车可有效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防护力、运载能力和作战性能均衡配置，能够在各种环境中采取行动，而且能够完全融入陆战网，有效提高了各部队协同效果。

当前，美陆军战斗力建设正步入新一轮改革周期，正按照“瘦身强能”的思路，沿着“规模较小但可逆转”的方向迈进，即在精简压缩的同时保持弹性，提高恢复能力、扩展能力和逆转能力，以便在“瘦身”过程中能够迅速扩充、重新生成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军事能力。然而，美陆军的改革是否成功，最终还要由战争来检验。